



立新照相馆：镌刻时代「影像年轮」

□ 宋华平

在历史的长河中，摄影是时光的守望者，它将转瞬即逝的瞬间定格为永恒的记忆。通辽，这片浸润着故事与温情的北疆热土，其照相馆近百年的发展历程犹如一部生动的城市编年史书，记录着岁月的痕迹与往昔的故事。

20世纪20至30年代，通辽城区开始出现照相馆这一行业。在新中国成立前，通辽城区有多家照相馆在经营，包括“素华照相馆”“大兴照相馆”“中美照相馆”“真光照相馆”“丽影照相馆”“远大照相馆”等，由于年代久远，新中国成立前通辽城区照相馆的具体数量现已无法精确考证。而通辽立新照相馆，无疑是这部史书中精彩的一页，它承载着深厚的情感与悠长的岁月，持续镌刻下独属于通辽这座城市的时代“影像年轮”。

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真光照相馆”创立于通辽北市场路东，开始为通辽百姓记录生活中的重要瞬间，或生辰之喜，或阖家团聚，那些早期拍摄底片，悄然开启记录通辽影像叙事的序章。“真光照相馆”的掌柜李同义，来自河北保定，创业初期，他从故乡招来经验丰富的师傅和伙计，随着业务的逐步拓展，照相馆规模日益扩大，掌柜李同义开始在通辽本地招收学徒，在此过程中，员工人数从最初的寥寥数人增加到8人，而在其传承脉络里张景林堪称关键人物。张景林出生于1929年10月，1943年，年仅14岁的他就到“真光照相馆”当学徒工，他悉心钻研技艺，将自己一生都奉献给了光影事业，其精神也深深影响着后来者在摄影之路上的追寻与探索。

1956年公私合营的浪潮席卷而来，“真光照相馆”与“丽影照相馆”“远大照相馆”整合资源，汇聚众长，沿用“真光照相馆”老字号，转型成为“国有企业”——公私合营通辽市真光照相馆，隶属于通辽

市饮食服务公司。老掌柜李同义被任命为通辽市饮食服务公司副经理、真光照相馆经理，张景林被任命为副经理。员工规模如雨后春笋般壮大至近40人。

1966年开始，“真光照相馆”更名为“立新照相馆”。期间，业务版图持续拓展，通辽市饮食服务公司在百货大楼对面成立“通辽照相馆”，“立新照相馆”设立了3个分部：在和平路原通辽旅社附近成立“立新分部”；在通辽市公安局对面原新兴商场二楼成立“东方照相馆”；在北市场路东原址成立“真光照相馆”。

1976年起，张景林被任命为立新照相馆经理，李平任书记。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北疆大地，通辽立新照相馆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迁至建国路中段路东，通辽市宾馆北侧后，凭借其精湛的摄影技艺和亲民的价格，立新照相馆迅速家喻户晓，深深扎根于市井之中。员工人数鼎盛时期多达百人，成为通辽市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近年来，立新照相馆用照片忠实记录着通辽各时期的社会风貌，镌刻着家庭与个人的成长印记。从婴孩的百日照、周岁留念，到新春全家福、毕业合影，再到企事业单位的职工合影，每一张照片，都是通辽人个体成长的蜕变见证，是家庭兴衰起伏的映照，承载着血浓于水的亲情凝聚、纯真质朴的同窗情谊，彰显着各行业的奋进精神风貌，赋予城市鲜活的情感。这些影像串起了往昔通辽人悠悠回忆与当下烟火日常，奏响饱含烟火温情与时代韵律的“影像乐章”，让城市的记忆与情感在岁月长河中绵延流淌、熠熠生辉。

1990年11月15日，张景林退休，张维正接任立新照相馆经理兼书记，严广发任彩扩车间经理。1991年，张景林儿媳朱晓玲从通辽市第二毛纺厂调入立新照相馆负责彩扩业务。1994年，严广发任立新照相馆经理，杨玉武任副经理。1997年3月，杨玉武任立新照相馆经理，赵常青任书记。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浪潮中，立新照相馆作为传统国营企业面临严峻挑战。为应对市场竞争，1999年3月启动彩扩车间承包经营机制，由朱晓玲承接运营。然而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深入，至2000年前后企业已陷入全面经营困境，难以维继。在此背景下，企

业被迫实施全体员工轮买断方案，这个承载着时代记忆的国营企业在完成市场化改制后，在新世纪曙光中黯然退场，国有企业立新照相馆退出历史舞台。

2001年，张景林儿媳朱晓玲肩负起传承的使命，沿用“立新照相馆”老字号，店址设在现建国路中段路西基大厦一楼，成为立新照相馆新一任掌舵人，开启了立新照相馆的新篇章。他们在传承经典的同时，积极拥抱时代，融入新时代元素，使照相馆焕发出新的活力。同年，立新照相馆在老店南侧50余米处开设“立新儿童摄影”分店，如初升朝阳般焕发活力，专注为孕产妇、宝妈及婴幼儿群体提供专业影像服务。

朱晓玲为立新照相馆注入了浓郁的文化底蕴与沉甸甸的社会责任内涵，她积极参与多项公益活动，2015年5月15日“国际家庭日”，立新照相馆携手通辽市委宣传部、市妇联，开展“寻找50个最美家庭活动”，为50个家庭免费拍999元全家福；同年8月4日在市图书馆举办“德润通辽·美在家庭”影展。疫情期间，联合妇联关爱援鄂医护家庭，赠1200元全家福等福利。2021年1月和2023年2月，先后为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提供全家福礼遇。诸多善举备受社会赞誉，尽显其责任担当。

从银盐颗粒到数字噪点，从暗房红灯到LED补光，变的是显影介质，不变的是通辽人瞳孔里的星辰大海。如今，立新照相馆的业务涵盖了人像摄影的全谱系，从个人写真、情侣写真、闺蜜照，到职业形象照、毕业照、全家福、婚纱摄影、证件照、产品与广告摄影，再到创意摄影、多元共生、各绽异彩，那些悬挂在千家万户的相框，依然是城市记忆的蜂巢，每个六边形里都封存着百年光影的蜜。

通辽立新照相馆作为情感传承载体、文化纽带，紧密牵系着通辽人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在时代的浪潮更迭中，它始终坚守在城市街角，扎根在通辽老百姓的心间，坚守初心，用镜头丈量岁月，以影像承载民众情感，记录通辽往昔点滴，将传承的使命稳稳扛在肩头。

通辽印记

“五子登科”：藏着千年祝福密码

□ 刘科

婚礼喜宴的红绸还在飘，满桌的佳肴冒着热气，总有人端着酒杯笑盈盈地说：“祝新人早日‘五子登科’！”

这句带着烟火气的祝福，像一粒熟稔的种子，落在中国人的耳朵里便会产生根——可若追问“这五子究竟指谁”，能说清来龙去脉的人却不多。

这“五子”的背后，藏着一个浪子回头的传奇，更藏着中国人对教育、德行与圆满的千年执念。

窦燕山：从“恶少”到“教子典范”

故事要从五代后周的燕山府说起。

那时的窦禹钧（字燕山）还是个让乡邻咬牙的人物。他家底殷实，却因年少丧父无人管束，成了个仗着财势横冲直撞的“恶少”：低价强买商户的绸缎，勾结官吏霸占贫民的田产，甚至在集市上见了不顺眼的书生，都要让人掀翻人家的书箱。百姓私下里叫他“窦扒皮”，见了他的马车远远就绕着走，眼里的怨怒像结了冰的河。

可三十多岁这年，一场梦劈开了他浑噩的过去。

夜里他睡得正沉，已故的父亲突然立在床前，眉头拧成疙瘩，声音像淬了冰：“你作恶太多，若不悔改，将来断子绝孙，死后连坟头都无人祭扫！”窦燕山猛地坐起，冷汗把里衣浸得透湿，心口像被巨石碾过——可不是吗？他富甲一方，却连个孩子都没有，偌大家业，百年后难道要落得“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那夜之后，窦燕山像换了个人。他先是把强占的田产还给原主，又打开粮仓，让管家按人口给贫苦人家分粮。有人说他是装样子，直到那年冬天，北风卷着雪片

子，有个乞丐冻僵在窦府门前，窦燕山亲自把人扶进柴房，端来热粥一口口喂，还让人缝了件棉衣。消息传开，乡邻们愣了半晌，才互相感叹：“窦燕山，好像真的变了。”

他修桥时怕工匠冻着，每天加两壶热酒；设义塾时挑书，特意选了带插图的本子，说“娃娃们看着图才爱读”。有次买木料，掌柜多算了两文钱，他发现后没骂人，只笑着说：“钱给你，但下次记着，做生意要实在，比赚多少都强。”

善行像春雪融水，慢慢浸润了日子。几年后，窦燕山的妻子接连生下五个儿子，他抱着襁褓里的幼子，看着床边四个围着看弟弟的孩子，突然红了眼眶：“爹，我懂了，这是老天给我的机会。”

他深知“养不教，父之过”，对儿子们的管教比自己做善事还上心。请来的先生是曾被他欺负过的老秀才，他亲自登门磕头：“从前是我混账，求您教孩子们做个好人。”家里的书房比正厅还讲究，案上永远摆着温好的墨，墙上挂着他的“学贵有恒，德贵有容”。

从“一门荣耀”到“万家祝福”

窦燕山的故事像一粒种子，落在中华文化的土壤里，长出了盘根错节的枝丫。

“五子登科”渐渐不止是窦家的事了。在科举定乾坤的年代，它成了无数家庭的执念。乡试前，江南的绣娘会给考生绣“五子登科”的荷包，针脚里藏着“一举夺魁”的期盼；北方的私塾先生会在考前讲窦家故事，说“你们看，窦家五子不是天生神童，是肯下笨功夫，更肯做善事”。

大户人家的灯笼上，画师爱画五个童子围着书案：穿绿衫的在磨墨，戴方巾的在写诗，最小的那个踮脚够书架上的书，旁边还摆着个算盘——既盼“金榜题名”，也盼“家境殷实”。普通百姓家买不起

灯笼，就用红纸剪五个小人贴在窗上，月光透进来，五个影子晃啊晃，像孩子们在院子里跑。

这四个字还悄悄融进了生活的细处。新娘的嫁妆里，梳妆台的铜镜背面常刻着“五子登科”，镜里映着新人的脸，镜外藏着“早生贵子、家族兴旺”的愿；老太太给孙辈做肚兜，会绣五只小鸡跟着母鸡，说“鸡”谐音“吉”，“五只小鸡”就是“五子”，盼孩子们平平安安长大。

苏州博物馆藏着一件清代刺绣荷包，上面绣着窦燕山教五子读书的场景：他坐在中间，手里拿着书卷，五个儿子或坐或站，旁边的桂花枝斜伸过来，萱草在角落开得正好。绣娘在边角绣了行小字：“贵子绕膝，无忧长安”——原来“五子登科”早已不止于科举，成了“子女贤孝、家庭圆满”的代名词。

到了今天，高考考场外，家长们举的牌子上还有“五子登科”的字样；新婚夫妇的婚房里，长辈送的摆件上，五个嬉笑的童子依然在传递祝福。有人说这是旧时代的说法，可仔细想想，从“五子登科”到“金榜题名”，从“家族兴旺”到“家庭幸福”，变的只是时代的表达，不变的是中国人对“圆满”的执着——就像窦燕山当年从“恶”到“善”的转变，我们始终相信：好的教育、正的德行，永远能种出最甜的果实。

这或许就是“五子登科”穿越千年的秘密：它从一个人的觉醒开始，长成了一个民族的信仰，而这份信仰里，藏着中华

名人典故

科尔沁民歌浩如烟海，在浩如烟海的民歌中大多数民歌已经找不到它的产生地和作者，很多民歌的产生地出现多地相争的局面。而有一首叫《包姑娘》的民歌它的产生地、创作人、口头相传的传承人都很清晰，没有争议。

《包姑娘》这首民歌，产生于上世纪30年代，具体地点是现在的科尔沁区莫力庙苏木布仁巴雅尔嘎查。布仁巴雅尔嘎查在通辽城区西32公里处，当时是科尔沁左翼中旗达尔罕闲散王爷卓里克图亲王的领地，闻名遐迩的莫力庙就坐落在那里。由于莫力庙的存在，那里也是科尔沁草原政治、经济、商贸中心。每年的四次庙会，都要云集四方佛教徒和买卖商人。寺庙里的法式活动、小街基的叫卖、杂耍等民间艺人的表演与观众的喝彩，构成了欢乐的海洋。然而，在欢乐所不能及的角落，也有有情人不能成为眷属的独自哀伤，两情相悦的年轻人在庙会上相互遥望。《包姑娘》这首民歌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和传播的。

《包姑娘》歌中的主人公确有其人，叙述的是一件感人而动听的爱情故事。包姑娘1916年出生在科尔沁区莫力庙苏木布仁巴雅尔嘎查，他的父亲是科尔沁祖母哈布图·哈萨尔的直系子孙，曾是满清政府官员，清朝末年回乡定居。包姑娘是他父亲的第三福晋生的。

包姑娘天生丽质，聪颖过人，善良贤淑，心灵手巧。到了二八豆蔻年华，出落得像天仙一般美丽。相传每当包姑娘一出家门，就能吸引所有路人的目光。看到包姑娘，报柴禾的媳妇忘了回家做饭，老大爷、老大娘的眼睛眯成一条缝发出“啧、啧”的赞叹，小伙子们尾随其后一直到包姑娘家门口……

布仁巴雅尔嘎查的村民，如今已故的满都拉乎老人是一位民间艺人，他喜爱民歌，还熟通蒙古族说唱艺术，他也是《包姑娘》民歌的传播者和传承人。老人说我们了解包姑娘及《包姑娘》民歌的事儿，非常高兴，她穿上只有过生日和过年时才穿的蒙古袍，86岁的老人给我们演唱了《包姑娘》，然后，还给我们讲述了包姑娘及《包姑娘》民歌产生的经过。

他说，当时追求包姑娘的小伙子很多，其中有道尔吉、宝音都荣等，最终包姑娘只好听从父母之命嫁给了家住左中白音花苏木白音塔拉嘎查的那达木德，因那达木德有文化，家境又好。那达木德还是满都拉乎的表哥。包姑娘出嫁以后，小伙子们都曾很伤感失落，于是，具有艺术天赋的道尔吉经过艺术加工，创作了《包姑娘》这首民歌，他把宝音都荣写到了歌词中，通过宝音都荣的口来宣泄自己的情绪。

《包姑娘》这首民歌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抒发了青年男女追求爱情的个性解放，又反映了当时的社会背景，门第观念。这首民歌传唱了近百年，有三个版本，但最普及的还是当今传唱人马铁龙唱的这版。马铁龙唱的这版也是满都拉乎老人唱的这版，歌词的主要内容是：

宝音都荣：给骏马备上了雕鞍，去遥远的布林巴雅尔一趟，思想起情投意合的包姑娘，我心里一阵哀伤。
包姑娘：这是笑脸的鞋一双，哥哥在二月的庙会把它穿上，在二月的庙会穿上他，可不要忘记你心上的包姑娘，宝音都荣：心爱的骏马脱缰跑掉了，价值十两银子的嚼环还有什么用？

自从跟亲爱的包姑娘分了手，父亲留给我的十间房有什么用？

包姑娘：如果用父亲的家产娶了我，

怎能不跟你一起过生活？
因为你没能把我娶家，只能眼巴巴地望着你远行……

道尔吉失恋以后自暴自弃，破罐子破摔当了土匪。《包姑娘》这首歌唱到哪儿唱到哪儿，在他的土匪生涯中传播出去，一直流传至今，成为科尔沁民歌中的一首。

《包姑娘》是一首叙事民歌，叙述的是一对有情人没有成为眷属的故事，词曲属科尔沁短调民歌体系，有着浓郁的科尔沁民歌风格。歌词叙事性强，曲调优美流畅，带有伤感。

一首民歌，讲述了一段历史，反映了一个地区的文化底蕴。《包姑娘》民歌的保护和传承，对研究科尔沁文化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是对科尔沁民歌的发生、发展、传承研究更具有实际意义，可以说这是研究科尔沁民歌不可多得的参考资料。《包姑娘》民歌自产生以来广泛的传唱在科尔沁草原，尤其是在莫力庙苏木的民间代代相传，一直传唱。

在各地区都重视保护、挖掘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今天，莫力庙地区传唱《包姑娘》的老人越来越多，他们中有上自八旬老人，下至十岁儿童，他们为有《包姑娘》而骄傲自豪。无论是在茶余饭后还是在文化活动室以及田间劳作，他们都免不了唱起《包姑娘》。但是，随着当代艺术传播途径的迅速发展和年轻一代对流行音乐的喜爱，在加上村里大多数年轻人都到外地打工，民族民间文化面临失传的危机。《包姑娘》这首民歌也不例外，如果不及时抢救整理和制定传承规划，不久也会失传。

编辑手记： 加强科尔沁民歌保护传承

《包姑娘》作为科尔沁民歌中不可多得的“身世清晰”之作，其背后承载的不仅是一段未能圆满的爱情往事，更是一个时代的社会肌理与民族情感密码。从道尔吉唱歌声宣泄的惆怅，到满都拉乎老人珍视的传承，再到如今田间地头断续的传唱，这首民歌早已超越了文本本身，成为连接草原历史与当代的文化脐带。

在民族文化遗产抢救的当下，我们尤为需要以系统性的保护为这首“有故事的民歌”续航。这既需要专项经费的精准投入，为传承人搭建传习平台、记录原始唱腔；也需要创新培养模式，让热爱民歌的年轻人在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中找到共鸣——或许是在校园开设短调民歌课堂，或许是用数字技术复刻莫力庙会的演唱场景。唯有让泥土芬芳的旋律走进更多人的生活，这朵凝结着科尔沁人喜怒哀乐的艺术之花，才能真正穿越时光，绽放持久的光彩。

侵华日军掠夺与溃败的罪证

□ 刘忱

1935年，日本侵略者为进一步扩大侵略战争，把哲里木盟变成他们进行经济掠夺的战略基地。伪满国道局在通辽镇西侧的西辽河上，动工修建了一座钢筋混凝土大桥。这座桥1936年完工，桥长256.2米，桥面宽4.5米。伪兴安西省、兴安南省的农牧产品经这里源源不断运往日本和侵华战争的前线战场。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后，根据《雅尔塔协定》，苏联红军对盘踞中国东北的日寇展开了大规模的进攻。当时哲里木盟的鲁北——通辽——甘旗卡，鲁北——开鲁——奈曼是苏联红军解放沈阳的主要进兵线。8月10日，苏联红军后加尔方面军近卫坦克第六集团军的先遣支队翻越大兴安岭，于8月11日下午占领了鲁北镇。

8月13日，近卫坦克第六集团军主力在鲁北镇集结。这日凌晨，第六集团军派出侦察支队向通辽方向行动。苏军飞机轰炸、扫射了通辽飞机场，使